

一得之愚集

飄泊
之外

郭明福

中國人，叢甦著，時報出版
公司印行。

詩人楊牧在「柏克萊精神」的序裏曾說，留學生的文學他看怕了，而且早被白先勇、劉紹銘這些人寫盡了。我並不太同意他的話，證之於聲勢一年比一年浩大，人頭錯動在美國大使館前簽證辦出國（即使在中美斷交之後亦然），顯然花旗王國仍具有莫大的吸引力，亦即它內部層面的真相尚未完全為人所知。且近年來海外中國人所面臨環境主客觀情勢的變化，他們的意識形態將更難解和複雜，這些都將使留學生的文學繼續自作家的筆下流出，或偏於感性，或偏於知性，勾勒的不止是流浪人的苦悶和徬徨……

「中國人」是叢甦最近的作品，雖然只收

了兩個短篇（虹、窄街），三個中篇（自由人、野宴、中國人），但她却有一份自負，那就是描繪海外中國人對環境掙扎，內在幽隱未呈現的部份。說得明確一點，這不是一本愉快的書。儘管全書筆觸不乏關心與柔情，但基本情調却是建築在理想與現實衝突、付出和獲得不能平衡上。在衝突與無法平衡的夾縫下，十足透露對生命的無奈和感傷，這是本書最予人衝擊的部份，也是最軟弱的地方。

「虹」是唯一以臺北為背景的作品，「窄街」、「自由人」、「野宴」、「中國人」則全是發生在新大陸（主要是紐約）的故事。雖隔個太平洋，但「虹」所表現的期待和挫敗的對比，和「窄街」、「自由人」諸篇却脈息相通。沈文欣，一個腰圓髮禿，已屆哀樂中年的國文教員，在與十七年前的舊情人重逢後，幽會於碧潭，同宿於碧潭邊的旅舍，十七載的日夜相思，面對面接觸時，他却又像被挖空心的玩具人一樣，在沙發裏和衣過了一夜。李婷，這個由美回國省親的女人，宛如雨後出現在碧潭山上的那道虹，在沈文欣心目中，是個美麗的幻像，是個使他在庸碌平靜如死水的日子裏，唯一帶色彩，能追懷年輕浪漫歲月的影子。它要隔著「美感的距離」，只能出現在可望而不可及的春夢裏，它不能實際接觸，真正接觸，則虹散夢碎。對於生命只是溫吞水式的存在，沒有成就感的人，回憶是只配擁有的奢侈品，這種價值的肯定，真是殘酷的刻劃。

故事沒有太多的起承轉合，作者對人生反映的理念，借諸於書中人物之口，作一種主動呈現，這是本書的特色，只有「窄街」是用電影「平行發展」的手法，兩個情節同時進行——到交會時，即是故事的結束；我覺得這篇之動人處，並不在於「意識流」技巧的運用，而在於它觸及到一個深沈的隱痛——華埠傳統道德維繫力的衰頹，新一代與保守自制古老精神的疏離。劉小荃，一個為洗衣店工作，刻苦上進的好孩子；通尼李，一個為爭奪地盤不

惜舉槍殺人的流氓，是光明與淪落的對照，也是文化新舊之間的死亡與蛻變。劉小荃死於來自另一位中國人射出的槍彈，卑賤得像條狗樣躺在自己的血泊裏，這種無意義的死亡，（如同劉小荃的父親，無緣無故被一位波多黎各人由地下火車上推落鐵軌一樣），該譴責的不只於瘋狂行動的本身，而整個華埠，甚至全美國，都該負責。劉小荃的死，悲憤地意味着華人社會在海外曾引以為傲的道德的日薄西山；也殘忍地指出年輕一代在強勢文化的環境下，除了面貌外，精神思想無可奈何的改變。這種哀感，叢甦並沒為我們提出排解之法，也或許環境的無情，作者也難有挽回的良策。也或許作家的職責僅在於陳述反映事實，扭轉事實則是政治家和改革家的事。

「自由人」是全書中對比最強烈的一篇，而篇名本身即帶有濃烈的隱喻（Meaphor）成份。名為自由人，却脖子戴了枷鎖；一脚烏球鞋，另一腳却是破皮鞋；以四海、宇宙為家，看來無牽無掛，却是無根無梢的浪遊與放逐；外表披着冷漠的盔甲，心底却是無比的孤獨和膽怯；想自我肯定，因一個斷續號、問號，變成一個完完整整的句點，或一個轟轟烈烈的驚嘆號，結果却淪為左派份子製造暴動的工具；關心他的女孩子，想指引他回到溫暖的故土，他却神經錯亂，成為躑躅在唐人街頭的孤鬼遊魂；同樣是遊子，一個熱情執着光明而向上，一個灰暗軟弱而自我否定；在正反的映照下，勾出了少數形神不能相親的知識份子的迷失與淪落。在如此錯綜的矛盾下，自由人悲劇性的性格，無可避免走向自毀的命運。女孩子所代表的不僅是光明，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勇敢，而實質上也是一種精神——這種精神是儒家入世式的，是縣延數千年最「中國」的部份。所以，叢甦並沒有指明這女孩子何姓名何名，姓名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代表執着和超越的精神存在。

「自由人」裏提到釣魚臺的示威事件，它並未如張系國的「昨日之怒」所探討的那麼深

入，但却暗示海外中國人由政治因素的牽扯所激發的民族情緒，却是隨時可湧起的浪潮。儘管去國離鄉，但說得冷酷點，無論在那個環境生存都是政治的延伸。一些自美歸國的學者，提到不少留學生在「釣魚臺事件」後，突然左傾；這種病態而可悲的轉變，雖然並不意味留學生出國前，被構築的精神堤防已崩潰，但却反映有些人的定力和「免疫力」不够，與其苛責他們的難於把持，倒不如檢討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灌輸方式，一味以民族情緒作要求是脆弱的，只有訓練每個組成份子更理性，熱誠而不衝動才是最有力的武器。因為任何人脫離自由陣營，對我們而言都是雙重損失。

「野宴」和「中國人」在故事言，可分為上下篇，但其精神上是渾成一體的，它交待的不僅是文超峯、沈夢這對戀人的離索和苦痛，最重要且是作者用心所在的，則是由「我們是生活在別人屋簷下的夾縫人」的喟嘆，提昇為「壯漢伸出兩個香蕉粗的手指，伸過桌子，在文超峯左胸心臟處咚咚地敲着，嘴裏說：『家就在那裏！』（頁二三九），方寸靈臺的肯定！在現實裏，文超峯和林堯成，是完全不同典型的對照，一學文（歷史），一習理工（數學兼電腦），一自始至終固持自己的身份和性情（永忘不了自己只是身處異邦的中國人），一則像變形蟲樣能充份融入美國的環境（以金錢物質表達自己的身份），所以，在普通人的標準衡量，林堯成是成功的（包括得到沈夢為妻），只有他自己才曉得，在內在層次上本身是失敗者，因為沈夢的心屬於文超峯。得失是如此的微妙，我們可理解作者的筆下安排，同情多於剖析（大家都是浪遊人），道德重於浪漫（沈夢和文超峯重逢後，相約同行，屆時又爽約），丁長貴的出現是必需的安排，沒有丁長貴則文超峯悲歡情懷亦無法扭轉，全書也無法點出每個中國人該尋的方向。

藝術之所以高尚，除反映時代，刻劃社會外，最重要的它為芸芸衆生提供了一種人生境

困學之後

李漢呈

困學集，傅孝先著，六十八年元月時報出版公司印行。

傅孝先先生顯然是一位現代古典主義者；他的文學評論文集「困學集」的批評準繩，便

界。這種境界必需光明、深刻而具有道德意味，理性而不全訴諸情緒尤其不可欠缺，如果說留學生的文學，叫人看怕了，那或許出在作品太賦於「情緒化」——由「中華文化的花果飄零」，到「異邦彩虹下哭泣的零雁孤鴻」，至於「捧着豬頭找不到廟門」的刺骨悲哀，我們怎麼忍心再看到「祖國啊！你在何處」的徹底麻木。平心說，「中國人」在技巧上並沒有求高妙的變化，它只忠實表達海外中國人生存的情境，而其心路歷程的追尋上則是由白天到黑夜，再由黑夜到黎明。不管未來歸向何處，但願不是陰暗的死谷。

由陳若曦筆下，暴露大陸知識份子的困頓和受摧殘；由叢甦的作品則領略到流浪人對祖國的渴念和焦急。這兩位夏濟安先生的高足，都具有「小說中含報導」的功力；而對於留學生，國內的人也可以以更富同情和諒解的眼光來看他們；（因為有許多人也會跟着出去，在就業的壓力下，這是不能免的路）而不會以時空的隔離，而劃在「非我族類」之內。「如果愛國，你就回來！」這類情緒話就可少聽到，更重要的，它告訴我們一個事實：擁有母土與根是一項幸福！